

导 读: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主要概念、原则、方法及争论

田海龙 赵 芃

《批评性语篇分析：经典阅读》（以下简称《经典阅读》）收录了批评性语篇分析代表人物 Norman Fairclough、Ruth Wodak、Teun A. van Dijk 等学者关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经典文章，同时也收录了以 H. G. Widdowson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批评文章。这体现出《经典阅读》的两个编写原则。第一，收录的文章均出自大家之手，而且是其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第二，收录的文章不仅出自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倡导者，也有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批评者。这样，编辑这本文集的目的便显而易见：通过阅读这些原版的、经典的学术著作，读者既可以了解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真谛，避免一些由于二手资料的偏颇与偏见可能导致的误解，也可以领略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全貌，包括它的一些不足与缺陷。

从历时的角度看，《批评性语篇分析：经典阅读》收录的经典文章贯穿批评性语篇分析发展的各个阶段，包括它早期的“批评语言学”阶段。从内容上看，所收录的文章涵盖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根据批评性语篇分析是一个新兴学科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将这些文章编辑为三个部分：1) 原则与视角，2) 辩论与讨论，3) 方法与路径。同样是因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对一些读者（尤其是学生读者）来说比较新，我们在对这三部分内容进行细致导读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几个关键概念，作为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基础和出发点。

一、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三个关键概念

批评性语篇分析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语篇/话语(discourse)^①这一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分析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揭示语言运用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体现的权力关系(如媒体报道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家与民众在话语权方面的不平等关系)。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实践者在分析这些话语的同时生产着自己的话语,并希望以此来改变这些社会问题,实现其社会价值。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其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某些带有自身特点的概念。在阅读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文献时,需要对这些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能将某个概念的含义与其他领域中类似概念的含义相混淆。这些概念包括:

1) 话语。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话语(discourse)”这个概念有着自己的特殊含义,它不同于篇章语言学中“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或“是语言单位与其它语言单位的联系”这样的含义,也不同于语用学中“在直接情景语境中的语言运用”这样的含义。它甚至不同于社会学中赋予“discourse”的含义,如Foucault所说的“discourse”是指知识客体建构过程中相关的社会规约。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话语”实际上一方面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书面的和口语的),另一方面还包括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制约这些语言运用方式的规约。或者准确的说,是具体使用的语言与制约这些语言使用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二者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话语的概念。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交流对象、所在场合以及各自依托的组织和机构在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句式、体裁、模式来传递信息、参与活动、构建身份、再现事实。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批评性语篇分析中关于话语的概念(参

见田海龙,2009a;田海龙、程玲玲,2010)。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不可避免的与语言使用者以及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批评性语篇分析要关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所在。

2) 批评。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批评(critical)”的含义也被很专业的界定。“批评”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吹毛求疵,或是专门关注负面的东西。相反,“批评”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被赋予很专业的含义。例如,“批评”被认为是:1)要揭示语篇与权力的关系,揭示语篇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2)这种揭示是很必要的,因为语篇与权力的关系在语篇中非常隐晦;3)批评意味着语篇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使其批评实践非常明确的反映自己的立场;4)批评具有解放的性质,所以批评要注重效果,要导致社会现实的变革(见Fairclough 1989, Wodak 1999, 2001, van Dijk 1993, Scollon 2001, Locke 2004)。赵芃、田海龙(2008)将“批评”的这些含义浓缩为两个,即1)批评是对语篇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探索,2)批评是导致变革的社会实践。“批评”是对语篇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探索,就是说批评性语篇分析要揭示语篇、权力、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批评是导致变革的社会实践,这表明,“批评”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要付诸于社会实践,一方面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实现社会的变革。中西方文化对“批评”的理解和认同有着不同的人文思想发展轨迹(参见Chilton, Tian and Wodak 2010),这使得受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熏陶的学生在理解批评性语篇分析时特别需要对“批评”这个概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3) 跨学科。从“话语”和“批评”这些概念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特定含义来看,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跨学科特征已是非常明显。但是,在阅读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经典著时读者还是要注意理解“跨学科”这个概念的特定含义。首先,批评性语篇分析所说的“跨学科”表现为它在研究方法上的兼收并蓄。毋庸置疑,批评性语篇分析基于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即使如此,它所采用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也是多种多

^① 一般认为,汉语术语“话语”和“语篇”译自英语“discourse”,彼此之间在意义上有所不同(可参阅田海龙,2009a;田海龙、程玲玲,2010)。这里为了论述方便,对二者之间的意义区别不做刻意强调。

样,包括话语分析、会话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等。而且,批评性语篇分析还要在此基础上,对语言学分析所发现的文本特征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甚至历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读者在阅读本书“方法与路径”部分收录的经典文章时对此会有切身的感受。其次,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跨学科”性还表现为它研究课题的社会性。批评性语篇分析不是以建立某种理论模型为研究目标,相反,是以社会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导向,而这些社会问题则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包括种族歧视方面的问题,也包括性别歧视的问题,体现在新闻媒体的话语之中,也表现在政治家的演讲里面,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权力滥用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学校、医院、法庭等等。所有这些,都突出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跨学科”性,也成为其“跨学科”的内容。准确的理解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跨学科”性,需要了解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渊源(张宵、田海龙,2009)。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阅读本书“原则与视角”部分中 Fairclough 和 Wodak 所著“批评性语篇分析”里面的相关内容。

二、导读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经典阅读》中收录的文章,主要介绍文章的核心内容,也包括这些文章的相关写作背景、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在批评性语篇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希望对读者的阅读有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帮助。

第一部分:原则与视角

“原则与视角”这一部分收录了四篇论文。第1篇是 Roger Fowler 的“关于批评语言学”。这是一篇公认的经典论文,也是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前身“批评语言学”的经典之作。1979年,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名学者 Roger Fowler、Gunther Kress、Bob Hodge 以及 Tony Trew 合作出版了专著《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开创了将语言研究与社会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经过多年的发展,批评语言学进入到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新阶段,但是到了这篇文章发表的 1987

年二者仍然处于一种相互交融的状态(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纪念 Halliday 的一本文集中,我们选用的版本出自 Caldas-Coulthard 和 Coulthard 在 1991 年合编的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读本)。这表明, Fowler 的这篇文章一方面体现着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原则和精髓,另一方面也带有浓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痕迹。

这篇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批评语言学”:1) 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语言学的关系,2) 批评语言学的核心内涵,3) 批评语言学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 4) 可能的解决办法。

文章首先谈到了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语言学的关系。文章指出,所谓“功能”有两层含义:狭义上讲的语言“功能”是相对于语言“形式”而言;广义上讲,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法被称为“自动语言学”,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是人脑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机制,一切语言规则都依靠此种“功能”自发生成,而 Halliday 则认为除“自动语言学”外还应该有一种“工具性语言学”,这种语言研究的“功能”在于研究语言使用的目的和原因。“批评语言学”就属于“工具性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其次 Fowler 在文章中明确了批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他指出社会语境中隐含的意识形态(ideology)是批评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则是主要分析工具。此外批评语言学还关注语言是如何成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这种社会实践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秩序,更是一种经意识形态再现的社会现实。正是如此, Fowler 在文章最后用较大篇幅论述了意识形态成为研究内容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关于发展现状, Fowler 认为批评语言学的研究已经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学术领域得到认可,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包括“批评(critique)”、“话语(discourse)”、“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以及“对话性(dialogue)”等等。尤其对于“批评”, Fowler 认为它不同于文学批评,而是来源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蕴含于语言中的价值评判,它帮助人们通过浮于表面的现象认识到真正的本质从而改变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认知和判断。

随后 Fowler 指出批评语言学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应用性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批评语言学还没有专门的专著或文章产生,因而缺少一定的理论标准和研究方法。虽然功能语言学可以成为研究工具,但是对于分析意识形态仍略显概括,不能完全满足分析所需。在应用方面,Fowler 呼吁应更多关注某一特定话题(topic)或语态(mode)、体裁(genre)、语境(context)(包括历史语境、经济语境、机构性语境等)或者进行语料库(corpus)式的研究以扩大研究范围。

Fowler 在这篇文章中对批评语言学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具有一定的里程碑作用,而且现在看来,他当时在文章中所提及的应用领域在随后的 20 多年间批评语言学均一一涉及,可见这篇文章对当时和随后的语言学研究起到了很强的引领作用。

第 2 篇是 Norman Fairclough 和 Ruth Wodak 合作的“批评性语篇分析”。这篇文章发表在 van Dijk 主编的《话语与社会实践》(*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1997)一书中,被认为是系统阐述批评性语篇分析理论来源、研究方法、分析模式的经典文章,也被认为是理解批评语言学发展到批评性语篇分析阶段的首选文章。文章首先简单介绍了批评性语篇分析对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观点,即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dialectical relationship),认为话语被各种社会环境塑造着,同时也作用于这些社会环境。接下来文章阐述了批评性语篇分析产生的现实需要,指出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且突出(salient)的作用,许多社会活动,如反种族歧视、和平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都有话语参与其中,尤以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明显可见,这些社会活动为批评性语篇分析提供了潜在的需求。关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渊源,文章从 Gramsci 的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平民社会(civil society),Althusser 的意识形态理论, Foucault 的话语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 Hegel 和 Habermas 对批评的讨论,以及 Bakhtin 与 Kristeva 的互文性理论挖掘并讨论了批评性语篇分析中常见的概念,如权力(power)、意识形态(ideology)、话语(discourse)、批评(critical)、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等。

批评性语篇分析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试图探讨的是话语在这种塑造(shape)与被塑造(shaped)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由于话语分析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经典阅读》收录的这篇“批评性语篇分析”总结了当时(1997 年)存在的 8 种分析方法:(1)以 Foucault 为主的法国话语理论(French Discourse Analysis)。话语理论关注话语的生成原因以及话语对于社会的作用,但这种关注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并没有涉及具体的社会实践。(2) Kress 和 Fowler 为主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批评语言学受系统功能语言学影响,试图通过语言及物性、名词化等手段分析出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语言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可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的第 1 篇文章)。(3)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他们认为当代社会充满了以各种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如声音,图片等。Kress 和 van Leeuwen 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了各种视觉图像并讨论了它们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后来这一分析模式发展为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4) Fairclough 的社会文化变迁与话语变迁(Sociocultural Change and Change in Discourse)。Fairclough 通过分析各种杂糅的文本和体裁,讨论这些话语在各种话语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中的作用。(5)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研究(Socio-cognitive Studies)。通过对认知的分析揭示社会结构同语言结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一方法尤其被用于揭示存在于各种种族歧视中的权力滥用和不平等。(6) Wodak 的话语-历史研究(Discourse-historical Method),分析了某一社会实践的所有历史背景和不同层次的文本。(7) Maas 的阅读分析(Reading Analysis)以及(8)以 Jäger 为首的杜伊斯堡学派。这些方法中的第 4、5、6 种方法,即 Fairclough、van Dijk、Wodak 的话语分析方法后来发展成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主要研究方法,我们在《经典阅读》的第三部分专门收录了介绍这些方法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 Fairclough 和 Wodak 通过对撒切尔夫人广播采访文本的分析,讨论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八大原则:(1)具有极强的社会针对性;(2)话语构建的权力关系;(3)话语构建社会与文化;

(4) 意识形态通过话语渗透于社会生活; (5) 话语具有历史性; (6) 话语是连接文本与社会的中介体; (7) 话语分析具有诠释性 (interpretative) 和解释性 (explanatory); (8) 话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原则与视角”部分的第3篇文章是 Teun van Dijk 的“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原则”。1991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支持下,Teun van Dijk、Norman Fairclough、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 和 Ruth Wodak 等批评性语篇分析家聚首阿姆斯特丹,用了两天的时间讨论了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确定了一个交流项目和许多合作研究项目。在随后的1993年,van Dijk 创办的期刊《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出了一集专刊,发表了上述几人关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重要文章。“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原则”就是其中的一篇。在这篇文章里 van Dijk 详细阐述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原则、目标,以及标准等问题。他提出批评性语篇分析就是研究话语、权力、权威 (dominance)、社会不平等 (inequality) 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应该关注话语在权力操控下的社会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批评性语篇分析家应该通过自己的话语分析进行社会实践并发挥作用。这里,van Dijk 将“权威”和“社会不平等”看作是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他认为,各种话语理论、分析方法、实证研究都应以揭露这一复杂现实为目的。作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家,他强调,首要的任务是分析那些引起或控制这些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权势者的话语,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达到改变这种不平等现象的目的。

van Dijk 进一步解释到,权力是一种认知形式,它既可以体现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让人们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控制 (control)。但是权力还可以体现为一种话语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控制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按照权势者的意图行事,故而话语方式成为了一种实现权势与社会不平等的路径。如果可以控制的话语体裁、语境、参与者、受众、语域乃至具体文本越多,那么控制这些话语路径的人就越有可能成为权势者。换言之,谁拥有的话语权越多,

谁就更有权势和控制能力。话语与权势是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而连接两者的媒介叫做社会认知 (social cognition)。van Dijk 认为,共享的背景知识、说话人的态度、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认知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以从中得到对某强势话语详尽的描述和解释,可以通过具体的话语结构看其如何决定特定的心理活动,通过话语结构了解某社会现实的构建过程和原因。此外,van Dijk 还提出了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 的研究方式,主张将文本、对话、社会认知、权势、社会以及文化综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并且认为这种研究不仅仅能够满足传统语言学强调的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和揭示充分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实效性和相关性。在文章的最后,van Dijk 通过对微观话语结构到宏观话语结构的分析,结合社会认知模型,对一场关于种族话题的英国议会辩论进行了分析,揭示其中话语与权势间的关系。

第4篇文章是 Ruth Wodak 的“什么是批评性语篇分析——关于其历史、重要概念和发展的概述”。这篇文章发表于2001年,选自她与 Michael Meyer 合编的主题文集《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方法》。这个文集在2009年再版并在内容上进行了扩展和修订。我们选编这篇文章主要是由于它对批评性语篇分析发展历史和主要概念的概述对读者会有所帮助。在这篇文章中,Wodak 首先回顾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发展轨迹。她指出,在当时“批评性语篇分析”和“批评语言学”虽然相互交叉使用,但是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前者,并用批评性语篇分析指代批评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她还指出,批评性语篇分析也不同于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侧重于描写和解释语言变体、语言变化以及交际结构,语用学的研究则侧重分析说者的语用能力。当然,批评性语篇分析与 Chomsky 的语言学更是有天壤之别。批评性语篇分析,她指出,注重研究话语的生产与解读以及这种生产与社会因素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接下来,Wodak 讨论了 Teun van Dijk、Norman Fairclough、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Siegfried Jäger 以及 Wodak 本人从事批评性语篇分析研究的侧重点,借此说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这篇文章中 Wodak 详细解释了三个在批评性语篇分析

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批评”、“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三个概念均源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语理论，并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得到发展。例如在谈到“权力”时 Wodak 认为，从语言学家的角度看，并不是说语言有权力，而是语言使用者所具有的权力赋予话语以权力，因而她强调话语分析更需要关注语言的使用者。此外，批评性语篇分析还提倡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从多方面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当然，批评性语篇分析还有一些局限，例如语言层面的现象与社会现象联系的机制是什么，如何开展更为有效的跨学科式的研究，以及如何深入研究“语境”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Wodak 在文章的最后谈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部分：辩论与讨论

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摆脱被批评的命运。为了再现这一历程，说明批评性语篇分析在批评中发展壮大的经历，也为了从不同侧面认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精髓，我们将《经典阅读》的第二部分设为“辩论与讨论”，收录了对批评性语篇分析持批评态度的 Widdowson 的三篇文章，以及 Blommaert 和 Billig 讨论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两篇文章。与此相对应，文集还收录了 Fairclough 的回应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围绕批评性语篇分析进行的三场争论。从时间上看，可以说是每隔几年就有一场大的辩论。第一场辩论发生在批评性语篇分析刚刚萌发的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在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和 *Discourse and Society* 两个期刊上，Widdowson (1995, 1996), Toolan (1997), Schegloff (1997), Stubbs (1997), Hammersley (1997) 等人对批评性语篇分析进行了激烈批评，Fairclough (1996) 和 Billig (1999) 等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倡导者对这些批评作了积极的回应。第二场辩论是在21世纪初，包括 Chilton (2005)、Widdowson (2004)、Blommaert (2005) 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质疑，以及 Wodak (2006) 对这些质疑的反驳。第三场是在2008年，在这一年出版的 *Discourse and Society* 第6期上，Billig (2008) 提出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语言问题，Fairclough (2008)、van Dijk (2008) 以及 Martin (2008) 参与讨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经典阅读》分别收录了这三场辩论的部分文章，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扩展阅读其他相关文献。

从内容上看，第一场辩论围绕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政治责任（political commitment）、理论基础、文本收集方法及文本分析方法展开。关于这场辩论，《经典阅读》收录了 Widdowson 发表在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5 年第3期上的论文“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Review”以及 Fairclough 的回应文章。Widdowson 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批评话语分析从某一特定观点出发对文本进行带倾向性的解释；他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虽然在术语上是“分析”，实质却是“解释”。在他看来，话语是意义商讨的语用过程，因此处于不同的情景条件、处于可产生不同事实版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之中的话语可从文本引出不同的意义。他相信相同的文本会因解释者与生产者的观念和立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话语。他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拒绝合作原则，拒绝接受文本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从文本中导出符合自己意愿的意识形态。在这篇文章中，Widdowson 还认为很难将语言数据的分析与社会数据的分析紧密的联系起来。他承认话语是社会环境中的语言运用，但是他主张，要么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分析数据，将话语限制在语言学的范畴之内；要么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分析数据，把话语限制在社会学的范畴之内。他坚持批评性语篇分析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是不可能的：话语与社会之间总是存在区别，一种探索方法不可避免地要优先于另一种。作为对 Widdowson 观点的回应，Fairclough 在“A Reply to Widdowson”的文章中指出，批评性语篇分析毫不隐晦它的参与者拥有政治使命。他坦言，批评性语篇分析者发现社会的弊端，发现语言在其中作梗，所以要运用语言来干预并实现社会变革。他进一步指出，包括 Widdowson 在内，我们的写作都是一种话语实践，表明特殊的兴趣、责任、包容和排斥。

关于第二场辩论，《经典阅读》收录了 Blommaert (2005) 在其著作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中的一节：Pros and con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首先，Blommaert 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过分强调语言分析。他指出，批评性语篇分析，尤其是 Fairclough 的方法，特别

重视文本的语言分析,具体来讲,就是依赖系统功能语言学。Blommaert 认为这种对语言分析的强调会带来一种假象,似乎批评性语篇分析所关注的仅是可见的和现存的话语,而对那些看不见的话语,如在语言使用者生产这些可见话语之前社会就作用于他们的那些话语,以及生产这些可见话语之后这些话语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批评性语篇分析就漠不关心了。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对语言分析的过分强调和依赖将分析的范围限制在了以文本为存在形式的话语上面,从而忽略了对分析话语的来龙去脉。在这篇文章中,Blommaert 还指出批评性语篇分析局限在特定社会之内,例如,批评性语篇分析的领军人物 Fairclough、Wodak、van Dijk 和 Chilton,以及社会科学方面对批评性语篇分析有影响的 Foucault、Bourdieu、Giddens、Habermas、Zizek、Baudrillard 等人,主要局限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他认为,这是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地域上的局限性。另外,他还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还存在研究内容上的局限。例如,批评性语篇分析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也主要是第一世界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南北关系”问题,亦不是世界体系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社会理论。他认为,没有理由将话语的批评分析限制在高度集中、后现代、后工业化、高度符号化的第一世界社会,更没有理由认为对这样社会的描述可以当作模式被有效地用于理解当今世界的话语,因为世界要比欧洲和美国大许多,而且这个世界上社会与社会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另一个问题在 Blommaert 看来是它时间跨度的局限性。他指出,在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话语研究中很少有历史发展的分析,其原因在于批评性语篇分析对可见话语的重视,使得批评分析集中在“当前出现”的话语上。另外,批评性语篇分析关注第一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将批评分析集中在“本国热点”问题上也是一个原因。他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历史视野的窄小以及重横向轻纵向的研究对批评当今社会整体特征以及在批评中对权力问题的关注极为不利;而且,这种横向的研究即使对社会问题的历史背景及互文性感兴趣也不能替代对权力如何发挥作用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对于 Blommaert 的这些观点,以及 Widdowson (2004)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批评,Wodak (2006)进

行了回应,她认为,Blommaert 与 Widdowson 一样,没有提出任何有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方法,而是采取某种手段“将自己的研究与其它研究区别开来”,如采取批评性的评论,或是指出某些未解决的问题,或是综合一些方面而详述其它方面,亦或是贬低(歪曲)相关方面或不提及重要的研究(Wodak 2006: 603)。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扩展阅读 Widdowson 和 Wodak 的相应文章。

最近一场围绕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辩论由 Billig 2008 年发表在 *Discourse and Society* 第 6 期上的文章引起。《经典阅读》收录了这篇题为“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语言:以名词化为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 Billig 指出,批评性语篇分析批评通过使用名词化的方式淡化活动的行为者,但是它的批评性语篇中却大量出现名词化的语篇策略;因此, Billig 认为,批评性语篇分析者在犯他所批评的错误:批评性语篇分析一方面揭露名词化具有隐含行为者和物化“过程”的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它自己的批评性语篇又在运用名词化的语篇策略。他进而指出,批评性语篇分析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名词化所包含的动词向名词转变的历史、词源以及文本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而只是把名词化当做了一个过程完成之后的结果,一个固定不变的文本特征。对 Billig 的批评, Martin (2008)、Fairclough (2008) 以及 van Dijk (2008) 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个观点是,批评性语篇分析因读者不同,使用的语言也可以不同;而且,批评性语篇分析不仅仅是揭露语篇中类似名词化隐含行为者这样的意识形态,它实现其政治目标也需要发展理论和方法,而这其中就需要使用“名词化”这样的技术术语,以实现“抽象”和“物化”的作用(Fairclough 2008)。《经典阅读》收录了 Fairclough 的这篇回应文章。读者还可以阅读 *Discourse and Society* 2008 年第 6 期上发表的其他相关文章,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这场辩论的内容,更可以加深对批评性语篇分析精髓的理解。

第三部分:方法与路径

批评性语篇分析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主要有 Fairclough 的“辩证—关系”方法,Wodak 的“话语—历史”方法,以及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方法。《经典阅读》在“方法与

路径”部分收录了这方面的三篇论文，读者可以据此细致了解这三种研究方法。

第1篇文章是Norman Fairclough的“新劳工话语：批评性语篇分析”。这篇文章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辩证—关系”方法的基本内容和分析框架。Fairclough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批评性语篇分析研究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话语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社会变革对Fairclough来说就是“全球化”，或称作“知识经济”。他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形式；话语与社会实践中的其它形式存在着辩证联系，并对其它形式产生建构和转型的作用。他甚至认为话语在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中以多种方式成为一个更明显的成分，许多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似乎都是被话语的变化所引发和驱使。故而他对话语的研究侧重话语的社会实践性，认为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可以在研究社会变革和政治经济“全球化”中发挥巨大作用。所以，他的研究框架不仅包括文本分析，而且包括话语实践分析；话语实践分析联接文本分析和社会分析。在这篇文章中，Fairclough不仅解释了他的研究方法涉及的许多概念，如话语、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体裁等，而且对他1992年提出的三维分析框架（Fairclough 1992: 73）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在这个新的分析框架中，Fairclough首先明确了话语分析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目的，并将原来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分析两个部分融为新分析框架的第二步，更加突出了话语实践作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连接体的作用，以及对这个连接体的分析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Fairclough详细阐释了他所提出的话语实践分析的两个部分，即“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和“互动分析（interactional analysis）”。前者包括对话语秩序的分析 and 体裁链的分析，后者包括对文本结构和具体语言运用的分析。在文章的最后，Fairclough还通过对工党“福利改革绿皮书”文本的分析具体阐释了其“辩证—关系”研究方法。

第2篇文章是Ruth Wodak的“话语—历史”研究方法。Wodak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话语—历史”分析方法，并总结了该方法的11个特点，例如，话语历史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的，且多学科性是多层次

的，存在于理论、研究、术语和实践几个方面；这种分析方法是以社会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某个语言问题为中心；注重将实地调查和人类学应用到研究当中；“话语—历史”研究方法是循序渐进的，理论和实际素材分析之间需要不断的反复；研究多种语体和多种公共领域，互文和互语关系是研究的内容；再情景化是这些语体（包括语体与主题和论点之间）联系的最重要的过程；在解释话语和文本时总是联系历史背景并对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分析的范畴和工具根据分析的步骤和研究的对象来决定；宏观理论是基础，在具体分析中，中层理论更能满足分析的目的；实践是目标，研究结果应该对多个领域的专家有用，而且能够应用并导致某些话语和社会实践的变化；等等。

在这篇文章中Wodak还提出了“话语—历史”研究方法的分析框架，认为在进行分析前，首先要确定分析什么内容，确定话语中所隐含的是什么意识形态意义。在这一分析阶段，“话语—历史”方法非常强调历史背景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根据历史背景才能确定所要分析的话语隐含着哪些意识形态意义，才能确定这个话语的具体内容和主题。分析的第二阶段对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互语（interdiscursive）”关系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intertextual）”关系进行研究。第三步是分析语体和文本，尤其是侧重语体和文本在实际运用中的意义，即分析话语策略。在这篇文章中，Wodak还从这三个分析步骤入手分析了“奥地利优先”请愿书中的种族歧视思想，具体阐释了“话语—历史”研究方法的实际运用。

第3篇文章是Teun A. van Dijk“批评性语境研究”。在这篇文章中，van Dijk首先指出跨学科性是批评性话语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并认为可以用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来替代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因为前者更强调批评式研究的跨学科多视角特征而后者则显得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方法。此外，批评话语研究不仅综合了多种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还将社会学、伦理学中的批判式理论融合于自己的理论中。之后，作者对“语境”这一概念进行了诠释。van Dijk认为语境是由处于社会情境中的参与者通过话语交流形成的一种主观建构（subjective construction），并借用了

心理学中的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s) 提出了一套关于语境研究的新理论: 语境模型 (context models)。

心智模型是存在于人脑情景记忆 (episodic memory) 中的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的对某事件的解读, 而我们对语境的传统认知正是由这些心智模型体现的 (represent), 因此 van Dijk 将这种情景性再现某交流事件称之为语境模型 (context models)。他认为话语不仅被社会情境和社会结构所影响, 而且还被这些由事件参与者构建 (construe) 的语境模型所影响。情景模型涉及到事件参与者如何计划、解读、限定各种与其伴随发生的情景。最为重要的是, 这些情景模型正是我们在话语研究中需要寻找的“结面” (interface), 它们是连接社会情境和话语的中介体 (mediate)。制约事件参与者如何说话的并不是他们的性别、年龄、阶层, 而是在于这些事件参与者如何限定 (define) 这些社会要素, 如何体验 (experience) 他们的身份。语境模型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这些现象的可能性。语境模型可以把话语者独特的个人经历、身份同社会情景相连, 这个意义上语境模型既具有个人性也具有社会性。从认知角度看, van Dijk 认为语境模型还具有控制话语生产, 动态结构并且需要经常更新等属性。

基于以上讨论, van Dijk 提出了“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 关注“谁”作为“什么”必须或需要对“谁”在“何种情况下”说什么, 为理解说话者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再现、理解、计划社会事件的方式提供了依据。在文章的最后, 作者通过分析 2004 年英国下议院一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具体说明了“认知语境模型”的具体操作步骤, 并以此具体阐释他的“社会—认知”研究方法。

Norman Fairclough、Ruth Wodak 和 Teun van Dijk 有许多关于其研究方法的论述, 这里选录的三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有一个实例分析来具体阐释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这对读者掌握这种方法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利。另外, 读者还应该认识到这三种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研究方法虽各有特点, 但它们彼此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点 (参见田海龙 2009b)。例如, Fairclough “辩证—联系”方法和 Wodak “话语—历史”方法都非常注重话语与话语、文本与文本之

间的联系, 这两种方法在“互语性”和“互文性”分析方面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另外, Wodak “话语—历史”方法和 van Dijk “社会—认知”方法也都非常强调社会认知在话语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 认为头脑中贮存的“模式”对话语产生以及对语境的认识到重要作用。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三种方法都非常注重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 尽管 Fairclough 多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 Wodak 多用辩论理论分析话语策略, 而 van Dijk 则多从对语境的社会认知来分析文本隐含的意义。

参考文献

- Chilton, P., Tian, H. and Wodak, R. 2010. Reflections on Discourse and Critique in China and the West.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9: 4, 489-507.
- Billig, M. 1999. Whose Term? Whose Ordinarity? Rhetoric and Ideology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10(4): 543-558.
-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lton, P. 2005. 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 CDA: Modules, Blends and the Critical Instinct. In Wodak, R. & Chilton, P. (eds.). *A New Agend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9-51.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6. A Reply to Henry Widdowson's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1): 49-56.
- Fairclough, N. 2008. The Languag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eply to Michael Billig.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 (6): 811-819.
- Hammersley, M. 1997. On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7 (3): 237-248.

Locke, T.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Martin, J. 2008. Incongruent and Proud: De-vilifying "Nominalization",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 (6): 801-810.

Schegloff, E. A. 1997. Whose Text? Whose Context?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IV): 1-25.

Scollon, R. 2001. Action and text: toward an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 of text in social (inter)action, 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 action. In Wodak & Ma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2001: 139-183.

Stubbs, M. 1997.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DA.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III): 202-218.

Toolan, M. 1997. 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y Are People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III): 219-241.

Van Dijk, T. 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II): 104-141.

Van Dijk, T. A. 2008.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ominalization: Problems or Pseudo-problems?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6): 821-828.

Widdowson, H.G. 1995.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Review.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3):157-172.

Widdowson, H.G. 1996. Reply to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1): 57-69.

Widdowson, H. G. 2004. *Text, Context, Pretext: 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Wodak, R. 1999. CDA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32(1&2): 185-193.

Wodak, R. 2001. 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1-13.

Wodak, R. 2006. Dilemmas of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in Society*. 35: 595- 611.

田海龙, 2009a, 批评性语篇分析在中国: 借鉴与发展, 《中国社会语言学》第 2 期, 1-9 页。

田海龙, 2009b,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田海龙, 程玲玲, 2010, "Discourse" 的含义及其翻译, 《燕山大学学报》第 1 期, 68-72 页。

张宵, 田海龙, 2009, 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渊源看其跨学科特性,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第 4 期, 65-67 页。

赵凡, 田海龙, 2008,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 评介与讨论, 《南京社会科学》第 8 期, 143-147 页。

总 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性语篇分析:经典阅读 / 田海龙,赵芑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310-03967-8

I. ①批… II. ①田… ②赵… III. ①修辞学—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770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2 插页 400 千字

定价:54.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话语在我们的研究中不仅指语言的运用,而且被认为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与社会事实存在着塑造和被塑造的辩证关系。在当下社会,新媒体不断在人们生活中渗透,并与控制交际内容和方式的权力交织在一起,更使得话语在构建社会事实中的作用凸显。因此,我们认为,话语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研究课题。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话语成为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的关注所在。诚然,不同领域对话语的关注有所侧重,但是这些侧重也造成一些偏颇。例如,社会学传统的话语研究缺乏对话语进行细致的语言学分析,而语言学传统的话语研究则喜欢对话语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很少将这些分析深入到政治和社会的话语层面。

《南开话语研究》系列丛书提倡对话语的跨学科研究,重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如社会学、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管理等等)。丛书旨在探索话语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特别是认识话语在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南开话语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丛书系列,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用中文或英文撰写的专著和主题文集,也出版有助于进行话语研究的读本。我们期待着这个系列丛书能够对话语的跨学科研究有所推动,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有所贡献。

丛书主编: 田海龙 丁建新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